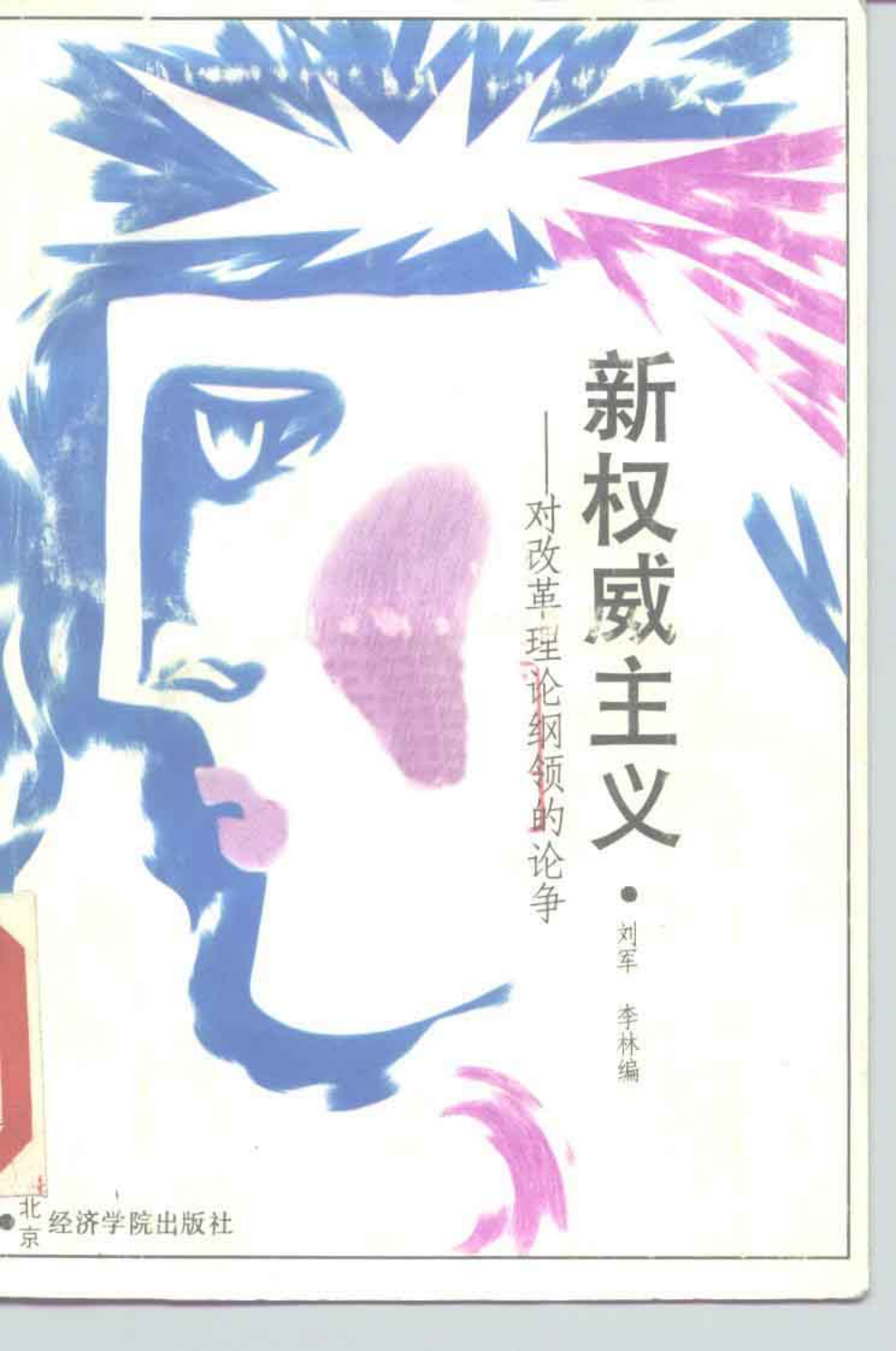




# 新权威主义

——对改革理论纲领的论争

• 刘军 李林 编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 新权威主义

——对改革理论纲领的论争

单敬

刘军 李林 编

**新权威主义**  
**Xinquanweizhuyi**

刘军 李林 编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红庙)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永乐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25印张 231千字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00 001—11 000

ISBN 7-5638-0147-2/D·11

定价: 3.95元

## 总 序

人力资源和文化资源（人力密集型资源）的开发，是中国民族复兴和文化重构的根本出路。中国有着世界上最丰富的人力和历史文化资源，也就要有世界上最丰富的开发方式。本丛书力图从经济、人生、社会等不同角度出发，为把人的能力和民族文化生产力转变成为经济财富、人生财富和社会财富，提供切实有益的方法和启示。民族兴亡，匹夫有责。自我实现，方法有用。我们盼望一切爱国、爱厂、爱家、爱自我的人们，都来发掘我们自身所拥有的巨大潜力。

我们真诚欢迎作者惠赐佳稿，稿酬从优。投稿邮箱：100013北京和平里中街12号《中国劳动科学》编辑部郑东亮、罗杰。

我们热情欢迎热心者包销、代销本丛书，发行折扣从优。欢迎购书者邮购。通讯地址：100044北京海淀区昌运官南1号楼3门701号易伟。

鸣谢：

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专家P·AMJAD（阿姆扎德）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院长周之良

中央美术学院青年艺术评论家尹吉男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管理系主任王新宏

人力资源开发丛书编委会

编者简介：

李林 1960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历史所《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辑。

刘军 1955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史学理论》编辑部编辑。

## 序 言

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的现代化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政府？

历史将证明，未来会回答，但留给现在的只有沉重的思索、艰难的选择。

在新旧文化冲突激变、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举步维艰的今天，一个由京沪两地几位青年学者提出的理论议题，已在华夏大地掀起一场波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的大论争。

无论它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还是出于实际国情的考虑，是囿于现实的权宜之计，还是发自理性的深谋远虑，它毕竟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向历史和未来交上的一份答卷。

围绕新权威主义的论争，如同本世纪中国曾出现的“科玄论战”和“社会性质论战”，是现时代社会危机的产物。它既是一部分知识分子怅惘、困顿、焦灼、亢奋之矛盾心态的写照，也反映了为理论界所代表的社会各阶层人士对中国如何走向现代化道路的不同抉择。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同自己的传统进行艰难而痛苦的对话过程，是一个由因无法避免而极不情愿，到终于鼓起勇气同当代世界的对话过程。这场论争即是这种对话的一个缩影。

对这场争论，一些不屑于过程而热衷于结果的人，一些

习惯于依赖学术之外的力量裁决的人，可能不会设想，这场论争的实质性结果也许要到下个世纪才能初见端倪。

在这个旋转的论坛上，“两刃相割，利钝乃见”的传统二值判断会感到力不从心。同样，寻求终极动力、单一决定论的思维方式也难免遭到诘难。然而，比论争输赢更为重要的是，在对立的观点中寻找互动的因素。从一些论者观点的前后演变中，人们已经隐约感觉到了。将历史的或然当作必然的判断，结论往往是两难的。如果人们更多地在两难之间，在诸多的是与不是之间去探索，或许可以发现更为明智的改革理论纲领和改革实践之路。

为后人计，为历史计，所有这场论战的参与者，无论是源于对真理的忠诚，还是得力于学术之外无形之手的支持，无论是理论界的名宿，还是后起的斗士，都必须绌尊纡贵遵守学术圈内的游戏规则。这就是在宽容的气氛中，以理性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它需要参与者必须正视这样几个问题：是否了解这场论争的来龙去脉？是否弄清对手的观点？所使用的概念是否规范和为对手所认可？学术探讨不需要裁判，但学术争鸣必须有规则。观点一经提出，白纸黑字，就不仅仅属于某个人，而是属于这一代人。所有的观点将随同这场论争本身一道接受历史的考验和判决。

正是为后人计，为历史计，需要原原本本、客观忠实地记录下这场论战。总有一天，当我们的后人感到这场论争再无继续的必要，甚至嘲笑它之日，或许正是我们达到目的之时。

作为史学工作者，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告诫我们，忠实地记录这次论战，也许同上阵拼搏一样有益。历史已不是单纯的过去，它蕴含着现实，揭示着未来。但史学以何种角度切

入现实，参与时代与改革，仍是一个有待探索的课题。在此意义上，本书亦可算作我们探索中的一次尝试。

在论争方兴之际，一切都处于变化和发展之中，以至我们只能借助于象征性的标点符号来展示论争的大致轮廓。历史是由合力推动的，唯此，我们对论争诸方所表现出来的真诚、胆识和勇气，致以同样的敬意。

诚蒙诸位论者同仁的信任与合作，使此书得以问世。并向曾协助我们工作的董正华、陈星灿、陈益民和靳润成先生，以及《人力资源开发丛书》编委会和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的朋友们表示感谢。

编者

1989年3月25日

# 目 录

---

|     |       |
|-----|-------|
| 序 言 | ( 1 ) |
|-----|-------|

## 1. !

|                     |                |
|---------------------|----------------|
| 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与协调 | 张炳九 ( 1 )      |
| 激进的民主还是稳健的民主        | 吴稼祥 张炳九 ( 27 ) |
| 新权威主义述评             | 吴稼祥 ( 34 )     |
| 新权威：通过市场化开往民主化的特别快车 | 吴稼祥 ( 39 )     |
| 新权威主义研究提纲           | 吴稼祥 ( 47 )     |
| 新权威主义：痛苦的两难选择       | 萧功秦 朱伟 ( 54 )  |
| 过渡权威论与中国的改革运动       | 萧功秦 ( 61 )     |
| 从林则徐到蒋经国            | 戴 晴 ( 86 )     |
| 政治发展中的民主和权威         | 杨百揆 ( 91 )     |
| 新权威确立之途径            | 黄 河 ( 103 )    |

## 2. ?

|               |             |
|---------------|-------------|
| 中国现代化需要集权政治吗？ | 荣 剑 ( 113 ) |
| 跳出历史的恶性循环     | 秦晓鹰 ( 132 ) |
| 新权威主义批判问答录    | 黄万盛 ( 148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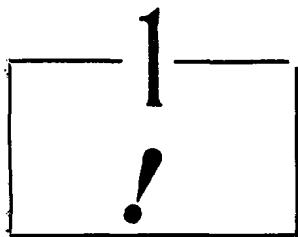
|              |         |         |
|--------------|---------|---------|
| 中国需要新权威主义吗？  | 于浩成     | ( 162 ) |
| 新权威还是法理权威    | 张宗厚     | ( 172 ) |
| 为什么不能赞同新权威主义 | 王逸舟     | ( 188 ) |
| 新权威主义与政治民主化  | 岳麟章 郑永年 | ( 196 ) |
| 评新权威主义的误区    | 郭苏建     | ( 207 ) |
| 反新权威主义论      | 韩水法     | ( 214 ) |

### 3. 1 ?

|                        |            |         |
|------------------------|------------|---------|
| 政治民主和政治稳态的相关分析         | 王沪宁        | ( 230 ) |
| 建立“硬政府，软经济”的发展模式       |            |         |
| .....                  | 陈一諮 王小强 李峻 | ( 246 ) |
| 新权威主义的三点疑难             | 远志明        | ( 250 ) |
| 权威·民主·现代化              | 刘军宁        | ( 252 ) |
| 过渡性民主权威论纲              | 郝 望        | ( 270 ) |
| 第三条道路：一种稳健的制度变革战略      | 顾 昕        | ( 282 ) |
| 现实需要权威，权威需要制约          | 黄十庆 张德华    | ( 294 ) |
| 第三种担忧：既无民主又无权威的状态是最可怕的 |            |         |
| .....                  | 孙立平        | ( 303 ) |
| “民主”与“新权威”论战印象         | 王小平        | ( 308 ) |

### 附录：

|          |         |
|----------|---------|
| 亨廷顿谈权威主义 | ( 313 ) |
|----------|---------|



## 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 改革的进程与协调

张 炳 九

**作者说明** 读者现在看到的这篇文章，是作者于1986年4—5月间在北京大学和中央党校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沙龙演讲”内容。同年7月，应贵州省政府之邀，作者又以此题在贵阳市做了四次演讲。原文收入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经济体制改革探索》（论文集）中。

文中提出的理论见解，当时就引起过争论，毁誉参半，没有定局。其主要内容是：

1. 中国的改革是一种全面的社会改革，它面临的对象是  
大一统的全能性政治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政治生活与经济  
生活合而为一，因此，改革应遵循“政治和经济分离”这一

综合性方针，使社会生活二重化。

2. 社会生活二重化造成双重结果或达到双重目标：经济上，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的体制转换，建立以明确产权为基础，以组织良好的市场为条件的商品经济；政治上，完成由直接管理经济的全能型政府向间接服务于经济的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转换，建立集权式的政治体制。服务型政府在体制上仍然是集权式的。但和全能型政府比较起来，它在活动范围和活动内容上有了重大变化。这种政府不再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其主要任务乃是为社会 and 经济发展提供公共物品，从事宏观经济调控、建设社会先行资本等等。在这个意义上，我把它称作“半集权制”。

3. “半集权制”政治体制是导向多元民主制的过渡性阶段。它存在的理由是：

(1) 商品经济在最初的发展阶段上尚十分脆弱，可资利用的经济政治力量主要还用于营建自身；它无力也无暇它顾，展开政治领域的进一步斗争。因此，容忍并接受政治上的“半集权制”是一种现实的选择。

(2) 服务型政府之所以不能立即采行分权模式，是因为分权式的政治体制运作的一系列规则、方法和规范不是现成存在的，它有待参照国际的经验并结合中国的国情创造出来。而创造是需要时间的。

(3) 分权式的政治体制是一种多元政治。它必须以经济的多元化作为自己的前提。但从经济的多元化（商品经济）到政治的多元化中间尚需必要的历史环节。只有在商品经济相当规模的发展中，这些环节才能提供出来，成为多元政治的社会基础。

4. “半集权制”是从全能政治转变为多元民主制的必要

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笼统地提出民主，过早地采行多元民主制的政治运行机制是不聪明的。比较起来，由一些具有坚定的政治目标又不性急冒进的政治精英采取强制性的手段，稳步推行市场经济，并在此过程中为实现多元民主制创造条件，可能是一条更为可行也更稳妥的选择。

这些见解正确与否，理应受到实践的考验和理论的批判。但迄今并未见有值得认真对待的批评意见；反之，目前就新权威主义展开的争论本身倒从实践上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本文的基本见解我至今仍坚持不悔。此次承李林、刘军先生之邀将这篇旧作重新发表，奉献给理论界的朋友，希望引出进一步的批评。我知道：作品既经发表就不仅仅属于我个人，因此，这次重刊我只作了个别文字上的订正。

1985年在改革的进程中是一个富有成果的年头。刚刚起步的城市经济改革很快遇到各种干扰；宏观经济失控引起的“危机”一下子触及了社会最敏感的神经。人们认识到：必须将经济改革置于“全面的社会改革”背景之下予以把握，因此研究的目光必须扩及非经济领域。

1985年下半年，“文化论争”的高潮突兴就反映了这个发展动向。虽然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探讨，自从粉粹“四人帮”以来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课题，但这次高潮的兴起，则从更广阔的领域、更深刻的层次上把这个问题作为对中国“全面的社会改造”的问题提出。改革不再被单纯地理解为由传统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而被理解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们不满足事后登场，仅仅做这场社会变革的编年史家或历史评论家，而是要“参与”改革；如果不仅仅从经济方面“参与”，而且要从非经济方面“参与”，那么，他就必须对中

国的历史与现状作出深刻而全面的思考，就不能把社会结构的各因素隔离起来孤立地考察，而必须在社会变迁的动态观念下，考察这些因素各自的变化和彼此的协调，并且以此为基础制定综合性的改革方案和发展战略。

这是一个难度颇大、要求颇高的课题，当然不是一篇文章所能解决的。本文只就社会结构的政治和经济两个重要因素进行分析，并结合我国改革的实际，就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进程和协调提出若干意见和设想。

## 一、政治和政治体制

在经济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提出，迫使我们对政治的内涵及其与经济的关系作进一步的思考。

打开政治学的发展史不难发现，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上，甚至在一个国家的不同发展时期，由于经济的、社会的以及其他方面的背景不同，政治学不断变换着内容，对政治的理解也很不相同。迄至19世纪为止，政治学一直保持着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创的传统，政治也大多是从道德和伦理的方面加以理解。这种状况，由于近代政治革命的完成，造成了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分离，产生了法治国家之后才有了变化。理性主义政治学的兴起可以说是这一变化的重要标志，其重点在于从法律的角度研究国家的起源和性质；政治的概念主要与国家联系起来，以致于政治学被确定为关于国家的学说。这种观点经过马克思主义的倡导和传播至今仍然具有广泛的影响。但到了20世纪中叶，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政治学的现实主义在西方一些主要

国家产生和兴起，它们扩大了政治的概念，把它理解为不同的社会集团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展开的斗争，目的是影响政府的立法和决策。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被看作是各社会集团之间展开斗争的过程，其内容则是各社会集团之间权力的对抗和协调。随着西方国家民主化的日益发展和政治参与形式的不断增多，政治学的行为主义以及后行为主义盛行，乃至行为主义政治学几乎成了政治学的代名词。它大规模地引进和采用了近代科学的基本方法和技术手段，进行政治行为的定量研究和分析，不仅为政治学提供了新的科学基础，同时也大大拓展了政治的概念。

以上的追述目的不在于提供一套关于政治的备用答案。目的是要说明一个道理：关于政治的万古不变的定义是不存在的。随着社会实践的深入和发展，政治也在不断变换其内容和形式。自然，迂腐的学究们可以永远恪守祖宗的遗训，他们的“学术”当然也应享有“自由”。但如果考虑到对政治的不同理解可以引出完全不同的理论，而那种脱离实践的理论必将变为教条，丧失生命，那么，当我们重新从理论上探讨政治的内容、本质和特性时，就应当特别问一问：当前的社会实践向政治学提出的要求是什么？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经济改革在实行中遇到了来自政治方面的障碍；不消除政治的障碍，经济改革就不能继续发展。虽然政治改革的问题远不是今天才在理论上提出，几十年来政治学在我国也以“阴燃”的形式保持“香火”，未至熄灭。但是，只是在今天，在需要对经济联系政治和政治联系经济加以综合考察的时候，它才在理论和实践上兀然突立，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中心。

本世纪40年代，由美国著名社会学家T·帕森斯首倡的

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把社会的变迁看作是社会结构一功能的替代过程。虽然一定的社会价值观念体系作为社会变迁的先导因素，象M·韦伯那样仍然予以强调，但帕森斯的理论显然是在社会结构诸因素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中对社会变迁作出描画：政治与经济一样，被当作社会结构的因素予以理解；政治作为独立的社会结构因素虽然予以强调，但经济仍然被看作是一个重要的因素。60年代以来帕森斯的理论虽然遇到了各方的挑战，但它至今仍有着重要的影响，不失为我们研究问题的一个参考。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帕森斯理论在若干重要方面与马克思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相契合。首先应被提到的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段著名论述。需要指出的是，象巴尔特那样依据这段话就断定马克思主义是“经济决定论”，极不妥当。马克思无论是进行长期的还是短期的历史分析，都十分注意各种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前者可以《资本论》为例，后者在对法国革命的研究著作中随处可见。但强调经济因素的重要作用，的确是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一大特色。只要不象苏联版哲学教科书那样，把历史的发展抽象地“归结”为经济，这就是一个可以普遍接受的思想。尤其是如果考虑到，在可以预见的历史发展阶段上物质财富的匮乏仍将是人类的主要困扰，经济在可见的未来仍然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那么强调经济因素的重要作用，并从此出发对政治——经济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就应当是一个理论上的重要支点。

在这种观念之下，这里提出政治的如下定义：政治是社会的结构因素之一，它以国家权力的形式集中表现出一定历史阶段上经济发展的状况和要求。

将这个定义展开，可以分解为以下几个规定：

1.和经济一样，政治是社会结构因素之一。在两者的关系中，这里强调政治是经济的表现，同时表明了经济作为基础的意义。

2.以国家权力的形式表现经济，是政治的特点。所谓权力就是力量。社会中的力量是各种各样的。政治作为一种力量，和其他力量一样，是支配性的。但政治的特征在于它以国家的形式出现，对社会中的个人和集团具有强制性。

3.政治作为强制性的国家力量，其作用在于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行，因而负有社会管理和社会控制的职能。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政治：第一，从政治哲学或政治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和其他社会因素一样，政治包含着一定的价值观念，或者说，一定的社会价值观念透过政治反映出来。一方面由于政治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产生的，另一方面任何政治总是由持有特定目的和价值信仰的人所建立的，因而政治总是与人类存在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第二，从政治运行的角度研究。既然政治的职能在于社会管理或社会的控制，那么就可以从它的运行过程、实施机制、功能效率等方面进行研究。这是一种功能性的研究，可以称之为政治的社会系统工程。第三，从体制方面研究。政治的社会功能是通过一系列的法令、规章、机构和人员设置等等实现的，它们的总和可以用政治体制的概念表达。但应当避免把政治体制与这些规章、设置等等直接等同。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包含着体现功能的意义。因此政治体制较为确切的定义是：为一定的政治功能所决定并且承担着政治功能实现的一系列法令、规章、人员和机构设置的总和。

政治哲学和政治体制之间存在着明显区别：（1）从内